

牟宗三先生在當代中國哲學上的貢獻

劉述先*

牟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貢獻自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此處只能本着他的精神，對於他所開創出來的豐富的觀念世界，略加指點，作為紀念而已。

牟先生生於一九〇九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前十年。但他的哲學精神是反時潮的。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病症的判斷是：「無體、無理、無力」。他一生所作的努力是要結合中西哲學的「理性的理想主義」的大流，扭轉時代衰頹虛無的風氣。正因為他反時潮，所以他的學術生命充滿了坎坷，但在他生前已經得到中外的肯認，堪稱異數。我認為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則在傳統中國哲學的詮釋，一則在當代中國哲學的開拓，以下略加舉証以說明我的論旨。

先說對於傳統中國哲學的詮釋。由於中國傳統的思考、表達方式與西方不同，故雖有甚深睿識，在概念分解上的精確性卻付諸缺如。牟先生第一個以比論的方式把宋明儒學的理論架構展示出來。他通過概念的分解清楚地辨明二程之間的分殊，而指出朱子所繼承的其實是伊川而非明道的思路。牟先生這樣的成就是有突破性的，即熊十力先生還常常訴之於即興的聯想而大發議論，就傳統思想的理解而言，牟先生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嘗說牟先生《心體與性體》的出版把宋明理學的研究帶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見解，卻不能不通過他的見解。而牟先生對傳統思想的詮釋決不只限於儒家方面。雖然他不是佛徒，卻費大勁著《佛性與般若》，皇皇巨著，特別是對天台宗「詭譎的圓教」的闡釋，別具隻眼，經常為佛徒所引用。道家與魏晉玄學方面，他也著有《才性與玄理》。此書剛出版時，從不輕易許人的業師方東美教授也譽之為「功力甚深」，由此可見牟先生在這方面的造詣。總之，牟先生斷定中土三教均肯定「智的直覺」。這樣的說法雖不能免於爭議性，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本處諮詢委員。

但牟先生對於傳統中國哲學的詮釋的深切透闢則是世所公認的。

其次說對於當代中國哲學的開拓。牟先生首先提出第三期儒學的觀念。先秦為第一期，孔孟思想係針對周文疲憊而起。宋明為第二期，理學乃對於二氏，特別是源出印度的佛教的挑戰的回應。當代為第三期，最迫切的問題即如何面對強勢西方文化的挑戰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牟先生發展了三統（道統、學統、政統）的說法，一方面反對全盤西化的偏向，另一方面也拒絕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做法。他認為吾人必須繼承道統，給與傳統的智慧與睿識以全新的解釋，顯發其現代的意義與價值，適足以對治時代衰頹的風氣。但他也坦承傳統之不足，既未能發展出西方式重視客觀學問的傳統（科學），也未能建立西方式民主法治的制度，因為中國過去僅只有治統，而沒有政統。牟先生年輕時費了很大勁去吸納西方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萊布尼茲與羅素、康德與黑格爾的傳統。他特別為康德所吸引，認為由之可以找到會通中西哲學思想的橋樑，垂老還以玄奘譯經的心情選譯康德的三大批判為中文。但他由中國哲學的睿識看出康德哲學之不足，在中年乃著：《認識心之批判》，到晚歲又著：《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圓善論》等諸書，來闡發與這方面相關的問題。牟先生認為康德囿於西方傳統，未能肯定智的直覺，而中土三教均肯定人能體證智的直覺。然由內聖而外王，本心良知發用，中國傳統未能照顧到分解的盡理的層面，走曲通的道路以開出科學與民主，故也有嚴重的不足。牟先生指出，當代儒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即開「新外王」。依他的看法，良知（道德心）必以「坎陷」的方式開出認識心，學會架構式的思維方式，才能開出客觀的科學知識與民主制度。牟先生的看法不能免於誤解與爭議。許多人誤以為牟先生主張中國傳統自己有足夠的資源產生民主與科學，這顯然並非牟先生的原意。牟先生乃是建構一個哲學理論，借用《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方式為中西哲學文化定位：一邊偏於無執的形上學，一邊偏於執的形上學，故必須執兩用中，才能達致平衡的綜合。但認識心要由良知之坎陷開出，是否會落於第二義呢？此處不免引發一些爭議，有待更進一步的探索。但牟先生的思想逼着我們對於這些問題作深一層的思考，成為討論焦點之所在，這本身就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與價值。後學者必須努力不懈，自強不息，才能秉承牟先生的遺志，為中國哲學開拓更寬廣的空間，以立足於世界。

預定在本年出版的英文劍橋哲學字典邀請我寫有關當代中國哲學的條目，因撰稿時牟先生在世，故不能有單獨關於他的條目，如今牟先生逝世，卻又來不及增添此一條目。但編者勞勃·奧諦（Robert Audi）教授指出，牟先生的名字已經進入索

引，有心讀者當可按圖索驥，不會有遺珠之虞。我在當代中國哲學的總條目中指出，「牟先生是當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創性與影響力的哲學家。」相信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私見，也是學界的公論。現在謹以中文重述斯言作為我們對牟先生的追思與紀念。